

论丛



基督教文化 与 西方文学传统

刘建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

刘建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刘建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8

(文学论丛)

ISBN 7-301-09282-2

I. 基… II. 刘… III. 基督教—宗教文化—影响—文学研
究—西方国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367 号

书 名: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

著作责任者: 刘建军 著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282-2/I·07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2.125 印张 34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刘建军，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英美文学和世界历史学博士生导师，1995年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000年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入选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专家。长期从事西方文学和文化学研究，曾经出版《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1993）、《演进的诗化人学——文化视界中的西方文学人文精神传统》（1998）、《20世纪西方文学》（2000）、《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2003）等著作。多部（篇）著作和论文曾经获得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以及吉林省和长春市等奖励。



- 钟嵘诗品校释 (吕德申)
词学理论综考 (梁荣基)
清代诗学研究 (张健)
文心雕龙研究史 (张少康等)
元代诗法校考 (张健)
楚辞要论 (褚斌杰)
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 (钱志熙)
红楼梦对话研究 (孙爱玲)
红楼梦: 爱的寓言 (裔锦声)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 (祁述裕)
苏联文学学派 (彭克巽等)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申丹)
否定性思维 (程巍)
跨文化之桥 (乐黛云)
俄罗斯诗歌史 (徐稚芳)
欧美生态文学 (王诺)
性别 种族 文化 (王守仁等)
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 (高旭东)
历史的星空 (胡家峦)
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 (赵振江)
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 (周小仪)
理念与悲曲 (丁宏为)
漂泊的灵魂 (赵桂莲)
文学阅读学 (龙协涛)
《圣经》的文学阐释 (刘意青)
灯下西窗 (陶洁)
文本学 (傅修延)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2002 年项目
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研究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文明史中心研究成果

序 一

刘建军教授的新著《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即将付梓，我有幸最先阅读了这部书稿，确实享受到“先读为快”的特殊韵味。不过我是学历史的，虽自幼喜爱文学作品，经常买一些小说、散文和诗词歌赋来阅读，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追求文学美的享受，至于对文学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对文学的治学之道，完全是个“门外汉”，没有资格对文学著作说三道四。尽管如此，我想从历史学的视角，谈谈刘先生这部新著的看法。

刘教授这部新著的选题，是研究西方文学传统里所反映的基督教文化影响，换言之，就是研究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的联系。这个选题视野广阔，涉及数千年历史，视角独特，分析深刻精当，充分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共同性和各国文学的特殊性。据我所见，这部新著在以下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著者对西方文化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给予特殊重视，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精心研究。该书在绪论之后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一开始就与宗教神话有紧密联系。他仔细研究了古希腊人的原始宗教是如何向神学宗教转移的，着重剖析了“从自然神灵到宗教神灵的三个抽象阶段”。从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和演变中说明它是如何为基督教的产生准备思想理论的土壤。恩格斯指出：“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

物。”这就是说“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①刘教授的新著告诉我们,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不是从中世纪开始,而是来自于古代的希腊罗马。这就突破了人们认为基督教的观念与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不相容的观点。

著者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第一大特征是,“希腊人是从人的自然本能需求出发来关注人自身遇到的问题。”古希腊人首先把自己看作是自然人,把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要求当作最高原则,为满足这些要求而积极活动。希腊人的神,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神话世界不是超凡脱俗地浮悬在天空,而是和现实人一样生活在地上。神的生活是人世生活的再现。第二大特征是,“希腊罗马文化是侧重文化体系构成的文化形态”。希腊罗马的宗教神话、哲学理论、科学门类、学术知识、文学艺术等等,都是能构成完整体系的文化形态。第三大特征是,希腊罗马人的学术研究都是为“提高人的自身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服务的”。希腊人按照自己的形体相貌和性别品格创造了神,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人神同形同性”的观念。人与神之间,不是统治被统治、服从被服从、信仰被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和谐相处的关系。由此可见,希腊罗马文化充满了人文气息。刘教授这些分析和论述,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及其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第二,欧洲历史发展表明,基督教虽然产生于古代的西亚,却盛行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基督教正是借助于新兴日耳曼人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才逐渐传遍欧洲各地。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一般地说,被我国学术界视为保守落后的象征。而刘先生独具慧眼,发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各“蛮族”具有很大的教化作用。究竟应如何评价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刘教授认为,“就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文化发展而言,基督教文化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基督教自产生后对欧洲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精神乃至文学精神的生成,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对后代西方文化的作用,绝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8—330页。

只是一个过渡的问题,而是一个奠基的过程!更是一个发展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他的这种看法与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否定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刘教授还认为,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和古典著作的破坏,不能记在教会的账上,因为破坏主要是在“蛮族”入侵的过程中发生的,并非基督教会之所为。在“蛮族”迁徙的过程中,教会还是罗马的国教,是“蛮族”打击的对象。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加特力教(正统基督教)之后,基督教会才开始与“蛮族”统治阶级结盟,随着法兰克王国的势力不断扩展,基督教逐渐发展为欧洲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这些新建的日耳曼人王国,恰恰是在改宗基督教之后才开始学习读书识字,开办学校,发展教育。据西方学者研究,“欧洲在公元500年以后到处都是修道院,那里有藏书室和缮写室,修士们深居简出,就像小小的学问中心。”^①西欧新兴的“蛮族”王国,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出现查理大帝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由此可见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会传播和发展中世纪文化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基督教和文学都是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弄清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必须首先研究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各地区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状况。刘先生认为,“在貌似一统的基督教文化形态下,其中隐含着四大地缘文化板块。”即西欧的天主教文化板块、东欧的正教文化板块、北欧的文化板块和西班牙西西里文化板块。随后书中逐个分析了各板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状况。同时进一步研究了中世纪欧洲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其内部的矛盾对立。刘先生新著的第二编第三、四章是研究中世纪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的部分。在我看来,这里有一些是刘先生独到的创见。由于自己不太懂文学,不便置喙。

第三,据我看,这个课题最难处理的部分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刘教授的新著认为,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和文学仍然保存了基督教

^① 詹姆斯·E. 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王鸣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的文化传统。西欧的文艺复兴(德国称为宗教改革)是从13世纪末叶开始直到16世纪末为止,历经3个世纪左右。这是由于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市民阶级的成长,提出了反封建的政治诉求。由于当时的基督教会处于西欧封建社会万流归宗的地位,要反封建必先反教会。因此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以人本反对神本,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所谓“神本”、“神性”、“神权”都是指教会说的,因为宗教大权完全掌握在教会手里。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张是信仰得救,信徒只要根据《圣经》虔诚地信仰上帝,自然就会得救,用不着教会仪式和购买赎罪券的救赎。这是强调信徒个人的作用,是一种“信仰的个人主义”,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如出一辙。应该强调指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只反教会的封建教阶制的压迫,不反基督教本身,所以对耶稣基督和圣母的崇拜如常。随后的17—18世纪是启蒙运动时期,即新兴资产阶级酝酿和发动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时期。他们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理性主义。用理性批判宗教信仰,批判中世纪的一切,反对任何宗教迷信。它比以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更加前进,更加彻底。启蒙运动发展的结果,在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500年间,是西欧各国文明转型和社会大变革时期,即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刘教授认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西方各国的文化和文学虽然反映的社会内容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基本上还保持了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有人会问这种传统究竟表现在何处?按照刘先生新著的解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是基督教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变化了的形式在文艺复兴的作品中再现出来。“如果说在中世纪‘二元对立’主要指的是上帝和人的对立,天国和地狱的对立的话……那么此时(文艺复兴时期——引者)不过是更强调的是这种对立存在于人自身,是人内心的矛盾性。这样一来,人自身中的善与恶、情欲与理性就变成了新的二元对立的内涵”。其二是“基督教的出现其实是欧洲人脱离自然本能的羁绊而走向人类精神世界的进步标志。而文艺

复兴运动时期,随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内涵的改变,人们具有了人类不仅要考虑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要考虑人的个人欲望的追求两者统一意识。就是说,开始把人类的精神需求和肉体欲望——灵与肉联系到一起加以考察了”。其三是基督教文化内涵阐释的改变。比如“上帝”的内涵,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是“敬畏”力量的代表,是最后审判的“权威”;在新兴资产阶级崛起并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上帝”就变成“至善”、“至爱”力量的象征,成为后来西方文化传统借喻的形式。这说明基督教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文化体系。

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是头足倒置的。马克思说:“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①基督教这些颠倒了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总有一天会把被颠倒了的国家和社会再颠倒过来,从而也就把基督教颠倒了的世界观重新颠倒过来。这一天就是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提升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15—16世纪以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1543年)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及其在17—18世纪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人的自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哥白尼“日心说”的确立不仅是天文学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而且是人类宇宙观的重大革新。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从此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②

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空前危机。基督教神学理论如果仍按旧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宣教,实在是难以为继了。于是“在人与神的对立中,寻找人的存在的科学与理性的基础,建立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2页。

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263页。

有自己独特基础的人的学说,并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去认识人,去考察人所特有的理性能力,就成了此时文化上最基本的规定”。“当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成为考察人的特征的主要手段时,人们必然会发现,人不仅仅只是具有情感欲望的动物,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人具有理性的力量和在理性指导下的创造能力。”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对历史文化的要求。

刘教授认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讲理性,但这是初级理性,即“情欲理性”,而启蒙运动时期所讲的理性,乃是高级理性,即“智慧理性”。一个人既要有初级理性,也要有高级理性,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理性人。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者认为,一个人所以具有理性,必须具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培根语)。知识与权力结合就能产生创造力,为人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种关于人的创造力的思想,“其实就是对上帝支配宇宙、支配世界、支配万物、支配人的宗教思想针锋相对的”。18世纪以后,“智慧理性”与“科学思想”结盟形成的“科学智慧理性”,构成西欧文化思想的主要内涵。因此,18世纪的西方文化界,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既是对基督教神学精神的反叛,又发展了自己的人学思想,如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一些大思想家,在反对神学思想体系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人学思想体系,而德国诗人歌德创作的诗体悲剧《浮士德》则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建立起新的“人学体系”。这些文化成果既是对旧的神学思想体系的批判,又是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

第四,欧洲在18世纪经过疾风暴雨的大变革之后,到19世纪逐渐平静下来。西欧的一些国家,如英、法、荷等国已经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新的社会现实,阶级对立依然存在,严酷的阶级统治使一些人丧失了往日的天堂,贫富分化益趋严重,广大的社会下层群众再度丧失了自我,宗教的慰藉又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必需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家园。于是基督教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他们对各种丑恶、暴政和压迫进行猛烈攻击的时候,也带有强烈的要到基督教中寻求解脱的思想情怀。”另一些人对启蒙理想的破灭和对暴政的反感,也想回到基督教

中寻找思想武器。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作品，一方面否定过去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血腥历史，另一方面则向往“没有压迫、没有暴政、人人自由幸福的新天国”。雪莱所梦想的天国，既是基督教的天国，又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也是和雪莱一样的作家。

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各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和诗人等，他们的作品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繁荣，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这一切都为大家所熟知，这里就没有必要赘述了。

岁次乙酉，时值仲春，清明在即，遵嘱为序。

朱 寰

2005年4月于长春

序 二

刘建军教授2002年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历时三年左右终于在这初夏稻谷、瓜果丰收之季结项并交付出版了。作为建军的学界友人和涉猎《圣经》文学研究的同行,我读到这部沉甸甸的硕果时非常高兴,这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我国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文学研究方面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中国的这支研究队伍更加壮大了。

自从上个世纪中期犹太学者奥尔巴赫(Eric Auerbach)在他那划时代的著作《模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里对《圣经·旧约》的独特文体作出了精辟的解析之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就掀起了把《圣经》当作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研究的热潮。截至80年代,这个领域不但发展得羽翼丰满,著作和文章如潮,而且带动了各欧美的大学开设出相关的《圣经》文学课程,把《圣经》的文学解读同现当代多元文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吸引了无数年轻学生对《圣经》阐释的兴趣。实际上,这个潮流最终做到了英国著名文人、思想家和教育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19世纪就致力要完成的事情,即把《圣经》从相对狭隘的宗教范围里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部西方思想、文化知识的重要教材。可当时虽有几名英国教授尝试着编撰读本,甚至开课,社会上却响应不多,对这一动议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因此阿诺德有生之年对此深感遗憾。但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时,越来越多的英美教授和学者认识到西方的年轻一代对《圣经》已经相当陌生,这使西方文学经典面临着巨大危机,因为不了解《圣经》,就无法读懂从乔叟到乔伊斯的整个西方文学精华,从而西方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和文化都会在未来丧尽。带着这种紧迫的任务感,20世纪后半期许多英美教授和学者积极地行动起来,紧随奥尔巴赫纷纷著书阐释《圣经》的博大和深邃,研究基督教文化和《圣经》对西方文学和思

想文化的影响,并且开设大学课程向年轻学子播讲和传授这个不能忽略和丢失的传统。这样,20世纪《圣经》和基督教思想文化研究就具备了突出的非宗教化并且学院化的有趣特点,因为目前从事《圣经》文学、文化、叙事以及意识形态研究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宗教界人士,而是大学的资深文学教授[如罗伯特·艾尔特—Robert Alter]和国际知名的文学理论家[如诺斯诺普·弗莱—(Northrop Frye)]、叙事和文体学专家[如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女权主义和文化批评学者[如米柯·巴尔—(Mieke Bal)]等等。他们从多元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角度,为《圣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性地丰富了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阐释传统。

无独有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不少有识之士也率先行动起来,把基督教研究从相对局限的宗教范围扩大到文化和文学研究,成立了研究机构、设立了大学课程、召开研讨会加强国内和国际交流,并著书立说。同上述提到的西方潮流类似,这个在中国逐渐兴盛的《圣经》和基督教研究的中心所在也是教会和教众之外的大学和研究院所,而参与的人员大多是具备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的文学和文化教授及学者。当然,我们不存在英美所面临的要保护西方文明和文化遗产的责任。但是,为了让已经进入全球化国际大家庭的中国更深刻地认识与我们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和领域中打交道的欧美,目前我国这个基督教文化和《圣经》阐释的研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须进一步扩大范围,加深探讨,并力求跟上国际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发展。

建军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大学来深造的一名学子。这一批学生中聚集了不少十分优秀的人才,个个都是凭实力从动乱年代浮现的佼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成为国内各单位的骨干、学术带头人或领军人物。我同建军认识多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又勤奋的学者,他思想敏锐,思维清晰,而且多年教授外国文学累积了丰厚的学识。最难能可贵的是,建军很善于进行思辨,从把握的资料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能用简练概括的语言把自己的意见生动地表达出来。这方面的特点在他以前的著述《演进的诗化人学》和《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中已有充分反映。这一次他的新作在这方面又给了我

很深的印象。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学这两个方面之中的任意一个都是十分庞大和繁杂的议题,要把它们合在一部著作中讨论,而且进行较深入的评析和比较,这本身就是难度很大的工程了。何况对这两者,之前在我国都有过一些论述,因此要做好,就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新意。在这方面刘建军教授没有令我们失望,他成功地用自己的思路和概念为我们清晰地梳理了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及它从诞生之日到后现代的今天对欧美思想文化和文学的介入和影响。

具体来说,这部著述比较全面和深入地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和思想与西方文学的内在联系,涉及的议题众多,比如基督教如何接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中世纪的教会学者如何一步步修正和填补基督教对人神关系的认识,以及各个宗教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西方文学对当时的基督教思想宗旨的反映等等。全书牵涉到的概念近百计,评介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横跨欧美大陆。从中世纪的凯特蒙、查理大帝和欧洲主要的英雄史诗一直到20世纪的乔伊斯、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作者系统地评述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宗教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达到了如此大的规模,这恐怕在我国外国文学界尚属首例。

在结构上,这部著作也颇费心思。作者首先提出了基督教是历史和社会的维系方式这个概念,然后围绕这个维系方式的作用和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演变来查看它对同时期和后世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梳理过程中,建军不仅创立了一些易为中国读者接受的、提纲挈领的术语和理论纲目,如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思与维的鉴别,信仰的理解和理解的信仰,情欲理性、智慧理性和政治理性,小宇宙和大宇宙等等,而且他还兼容了大多文学史评介中采用文本引文的特点,所以虚实配合,比较好看。

在评介的观点上,《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学传统》也注意采纳了最先进的看法。最典型的例子见于作者对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的一分为二的评论,充分肯定了当时寺院和僧侣在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如指出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基督教文化和文明的中心,而本尼迪克特派僧人则是维护学术的灯光,他们在东西各地保存旧的记述,并引发新的兴趣。但是,最让我感触的是建军表现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立场。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的学界出现了因

纠正过去生硬、简单地运用马列理论而走向了反面的倾向。不少学者只忙于引进最时髦的西方理论,甚至到了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东施笑颦,还沾沾自喜的地步。与我国这种简单化的扬弃态度相反,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的过程中却发现马恩读本一直是该校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必读书目,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也是众多理论体系之中很受重视的一大流派。当然,在我国也有不少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和历史主义观点的学者。但建军之所以在这方面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主要还是因为他并非贴标签似的略提几句来装潢门面,而是切实又中肯地多处采用了马克思的论著,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审视基督教文化和历史,并辅之以其他各派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显示了熟知西方的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和弗氏心理学等哲学、文学和文化理论。这种批评的方式和态度我以为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在《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这部专著即将问世之际,我要向建军致贺。正如他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以诗言志所说的:“云横天涯路无尽,求索再上赫曦台”,我在祝贺他取得这一成绩的同时,企盼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再次求索的硕果。

刘意青

2005年初夏写于北京大学燕园